

英汉语汇借用之跨文化交际视角诠释

戴建春

(温州医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温州325008)

[摘要] 语汇借用是语言交流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文化融合和语言发展的必然产物。文章试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诠释英汉双语在不同交际年代的互借互动特征以及交际中出现的“借用不对等”与民族中心主义,最后验证借词在跨文化交际中传通、融合异域信息的功效。

[关键词] 语汇借用; 跨文化交际; 民族中心主义; 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6-0102-03

语言学家 Hudson, R. A. 和 Goodenough, W. 在论及语言与文化二者关系时认为:“语言在绝大多数方面,蕴涵在文化中……因此某一社会的语言乃是其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1]诚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亦是文化的一部分。当不同的文化在交际中产生碰撞与冲突时,语言始终居于首当其冲的位置,而语汇是语言中最敏感的构成要素,它势必在交际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由于文化取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等的差异,不同文化间经常存在着语汇缺项现象,再者,随着社会历史的演绎,新生事物、新鲜概念不断涌现,进而在一些语言中找不到与原有语汇语言风格、文化意蕴尽相协调的词,这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弥补不足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自己创造;二是借用。^[2]可以说,借语的出现是语言交流中文化融合和语言发展的必然产物。

谈到借语现象,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借词(也称外来词、外来词)的概念作一澄清。学术界对外来词的界定莫衷一是:王力主张音译词才是外来词,意译词不应该算作外来词;^[3]而田惠刚则认为“意译的方式一直是汉语接纳外来词的一种主要方法”。^[4]本文提到的借词是指最广泛范围内的外来词,是“直接从外语引进的词,或者通过翻译一个概念或模仿一个概念,取自另一种语言的词”,^[5]因此它不仅包括音译词、意译词,还包括音意合译词以及在汉语中借用的英语符号等。近20年来,我国外语界十分关注“借语”现象。不少学者,如:郑声涛、汪榕培、齐揆一探讨了英语借用汉语词的规律特征,也有一些学者,如:朱务诚、周红考证了汉语中英语借词的输入轨迹,还有黄河清、洪文翰、常骏跃、邵志洪等学者分析了英汉语汇互借对各自语言文化的影响。以上学者的劳动为“借语”现象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这些著述主要是基于社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进行

的,并未专门从跨文化交际的宏观角度来深入解读中英语汇互借现象,本文试从这一视角诠释英汉双语在不同交际年代的互借互动特征,透析交际中出现的“借用不对等”与民族中心主义,并验证“借语”在跨文化交际中传通、融合异域信息的功效。

一 不同交际年代的语汇借用特征探析

语言学家 Sapir, E. 在论证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曾说,“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6]; Bloomfield, L. 在其《语言》一书中也提出:各民族语言是相互取长补短的。换言之,凡是有生命力的语言,都会从它所接触的语言输入词汇,同时也向其它语言输送词汇,成为别的语言的借词。^[7]

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借语现象亦自古已然。本文将切入较具代表性的时期来阐释中英双语的互借互动特征,以期管中窥豹。一般来说,跨文化交际中物质文化的借入要先于和多于精神文化的借入。^[8]自汉朝始,我国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但碍于时代局限,交际手段相当落后,主要固封于物质层面的往来。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英汉语汇的互借互动特征主要表现在物质词汇的相互借用上。如反映中国古代文明的“茶”、“丝”、“瓷器”等物品便纷纷直接或间接地进入欧洲大陆直至英国,这就使得英语中有了今日的“tea”,“silk”,“china”等词。汉语中也有不少借自英语的物质词汇,诸如咖啡(coffee),巧克力(chocolate),威士忌(whiskey)等。当然,当时来自西域的许多物质名词也由此进入了汉语,如我们熟悉的“葡萄”,“苜蓿”,“狮子”,“胡琴”等均属此例。另外,异质文化的移植亦往往带来丰富的外来词汇,汉语中现有的一些语汇便得益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及佛典的译介,譬如,“刹那”,“世界”,“觉悟”,“结果”等。可以说,物质层面的交往不仅丰富了各自语言的语汇,而且

[收稿日期] 2008-11-10

[作者简介] 戴建春(1976-),男,浙江温州人,温州医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也向对方传递了异域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施益于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16世纪末,传教士涉足中土,译介了大量西方科技典籍,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渠道。其后的晚清至“五四”前后的近百年,西方殖民者用炮舰叩开了中国的大门,旧的封建秩序及其意识体系同外部世界的先进科学文化有了大规模的深入接触。碍于中英语言符号的差异,人们最初通过音译的手段借入了大批反映西方政治文化等新鲜概念的词,如逻辑(logics),赛因斯(science),乌托邦(utopia),弥撒(mass),柏里玺天德(president),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等。虽然出于汉语自身的特征要求,多数音译词被后来的意译词所替代,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洞悉社会动荡变革时期中西精神层面交往的频繁。这一时期,一批反映中国特有文化现实的词汇也随之进入英语,如hong(商行),kowitz(叩头),yamen(衙门),kylin(麒麟),mahjong(麻将),tong(堂)等。这一交际年代英汉语汇的互借互动特征表现在精神、文化词汇的相互借用出现,语汇借用主要通过音译进行。

国际贸易、国际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信息社会的形成都早已促使地球上的大多数语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吸收陌生的外来材料并或多或少地加以同化。^[9]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英汉语的互借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全方位进行的时期。由于国际交往的频繁及国民外语水平的提高,一些专有名称及科技术语的表达已为民众所熟悉,诸如WTO, AIDS, MBA, TOEFL, GNP, IT等,这些英语符号的输入不仅易为国民理解和接受,而且也便于直接、准确地与国际社会的表达形式接轨。除此之外,汉语借用英语外来词尚有音译(休克shock, 马拉松marathon, 克隆clone, 阿斯匹林aspirin),意译(代沟generation gap, 热线hot line, 白领white collar),音意合译(呼拉圈hula-hoop, 迷你裙miniskirt, 因特网Internet, 蹦极跳bungee-jumping)及中英兼译(T恤衫T-shirt, BP beeper BP机)。这些来自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借词的输入,反映了汉语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力和兼容性,也凸显了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崇尚变异,“洋为中用”的真实心态。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及国力的增强,汉语的一些特色词也纷纷输入了英语,譬如,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 一国两制one country with two systems, 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 “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s”等。总之,改革开放以来,英汉语互借日趋频繁,内容丰富,方式多样,中英借词的输入逾越了词汇本身的蕴涵,淡化了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使文化信息在互动过程中达到最大限度的跨越与融合。

二 语汇“借用不对等”与民族中心主义

长期以来,在同西方异域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汉语借入了大量的英语词,但其输出的数量却不多,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历史文化的必然性。究其根源,除了英语作为拼音语言自身的优势外,近年来信息科学的急剧发展更使得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地位无可争辩。另则,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及综合国力等方面明显落后于西方大国。逾越上述客观事实,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思想层面的“民族中心主义”

问题。民族中心主义是由两个希腊词ethnos和kentron组成,是指某个民族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当作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它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隔离开来。^[10]可以说,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民族中心主义。实际上,西方的这种民族中心主义可上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使用“野蛮人”(barbarikos)来称呼世界上其他民族,在欧洲文化史上留下了“希腊人”/“野蛮人”这一著名的反义概念。我们知道,文化交流不应是单向流通的,而是双向互动的。但是自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西欧文化大规模地向世界扩张,西方“欧洲中心论”思想顽固抵制异域文化,凡此种给中西跨文化交际的平等对话埋下了不利因子,这种优位文化心理严重阻碍了英语对汉语词汇的借用。

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人多出少”的严峻事实深深刺痛了国人的民族自尊,一些语言净化主义者哀叹外来词泛滥,我国学术界也竭力要求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并确立与其他文化平等对话的地位。长期以来,中国文化都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主要贡献者,理应与西方文化平等相待。但对一个独立的国家来说,经济和技术实力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11]我们在自我觉醒的同时,更应全力投身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惟其如此,才能保证民族优秀文化产品不断外输到英语国家,成为他们语言文化中的活力因子,从而加大英语外来词中汉语词的比重,真正实现中英跨文化交际的平等对话。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民族中心主义会导致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不信任,相互仇恨;导致文化冲突;或使人产生优越感,从而加剧交际距离,不利于双方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笔者认为,不论是文化的发展还是经济的发展,都不会按照某一特定的模式展开,在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只能出现一个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局面。当今的世界在很多领域正日益显示出宽泛认同的趋势,科技经济等领域尤为明显。当然,一些国家也在竭力维护本族文化的独立性。可以说,意识到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视角的多样性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

三 借语与异质信息的传通和异域文化的融合

德国学者Bitterli曾提出四类跨文化交际情境:文化认知、文化交往、文化冲突和文化交织。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是遵循这个层级关系不断演变的过程。英汉语互借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也具有这个特点。外来语的输入减少了交际双方接受异质信息的中间环节,外来语的进入往往给输入一方的语言带来勃勃生机,因为它不仅丰富了该语言的表达方式,而且使该语言的使用者能直接感受异域文化的魅力,有助于摒除优位文化的心理偏见,加速不同文化间的跨越与融合。金·扬(Kim Young Y.)的适应理论(Adaptation Theory)认为: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是一逐步积累的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可描述为“紧张——适应——进展”。^[12]这个互相适应,互相接受的动态过程极大地推进了语言文化的一体化进程,有助于正确解读彼此语言文化的内涵,促成中英跨文化交际的直接化。譬如,时下国人常说麦当劳McDonald,耐克

Nike, 奥林匹克 Olympic, 以及英语首字母缩略词 AIDS, IBM, MTV, GRE 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又如,作为中国文化精粹的武术在对外宣传中,已由原来的 martial arts 换成了汉语拼音 wu shu,从而更确切地传递了汉语的信息特征,避免了交际双方的误解。至于国人常吃的馒头,豆腐,英美人也开始直接称之为 man tou, dou fu。本质上讲,借语的频繁使用,大大加速了英、汉语的国际化。虽然,目前汉语的国际影响远不如英语,但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汉语作为走向高度国际化语言的趋势将愈发明显,时下全球范围内的汉语热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从修辞功能来看,外来语如若使用巧妙,会带来语言美学角度上的某种魅力。填补词汇使用上的空缺是外来词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功用。当然,外来词也能使人们在用语言传情达意时做到言简意赅。外来词的“异域”色彩及其语义朦胧性,也使我们的表达更富情趣,溶入了鲜活的时代气息,在文学作品中常被用来表达幽默讽刺或其他多种情感。另外,外来词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国门洞开之后国人文化心态的悄然改变,成了某些人趋异求新的一种语言表现。最后,外来词还可以反映历史时代特征,外来词的谐音效果也用于广告口彩,如稳得福(wonderful),倍福来(Beverly)等。

四 结语

语言是一个巨大的动态开放系统,决定了语言作为信息交换的载体,必然要反映客观事物,反映社会,反映人的实践和思维。外来词的引入和使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映射出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同化力和兼容性。外来词与跨文化交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互惠的关系,正是在这个动态积累过程中交际双方传通和融合了大量异质信息,为彼此语言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贡献。但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在肯定外来词正面效应的同时,也该清醒地指出在使用外来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影响,诸如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的交流障碍,某些国人的盲目崇洋心理,

语汇语体的混乱使用等。有鉴于此,外来词的规范化便显得异常重要,此举有助于加快不同语言的国际化进程。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中英双语之间的语汇借用现象将越趋明显;异质信息的不断输入与接纳也将促使中西跨文化交际日趋顺利。

[参考文献]

- [1] Hudson, R. A. Socio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2] 陈原. 社会语言学(第1版)[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 [3] 王力. 汉语史稿(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4] 田惠刚. 汉语“外来词”概念界定献疑[J]. 词库建设通讯, 1993, (2).
- [5] 哈特曼. 语言与语言学辞典[C].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 [6] Sapir, Edward. Language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1.
- [7] Bloomfield, L. Language [M].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33.
- [8] [11] 关世杰. 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第1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9] 梁镛. 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版)[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10] Samovar, Larry A. & Porter, Richard E. & Stefani, Lisa A. (Eds).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3rd ed)[M].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 Co., 1998.
- [12] Kim, Young Y.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A], in M. K. Asante & W. Gudykunst e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 Newbury Park: Sage Pub, 1989.

Word – loa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DAI Jian – chun

(Wenzhou Medical College; Wenzhou 325008, China)

Abstract: Loan words are the inevitable product of culture fusion &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 course of language exchang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account for the loaning features between Chinese & English in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eras, loaning inequivalency and ethnocentrism i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n verify the function of loan words in conveying and fusing exotic cultur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loan words;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thnocentrism; culture fusion